

1937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后,抗战全面爆发。不久,上海爆发了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。1937年11月12日,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,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,但上海的租界,由于隶属不同国家管辖,日军不能进入,故被称为“孤岛”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,利用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发展起来。当时,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上海参与领导了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的工作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,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。

“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,在此‘孤岛’上艰苦斗争了四年多,而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,成绩尤其灿烂”

上海沦陷后,日本侵略军在其所占的南市、闸北、虹口、浦东、杨树浦等地到处设立关卡,沿苏州河各桥更是岗哨林立,戒备森严,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。

这时,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,因英、美、法等国是“中立国”而未向日寇占领,但已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,故有“孤岛”之称。它的范围是:东至黄浦江,西达法界(现名新马路)、大西路(现名延安西路),南抵民国路(现名人民路),北临苏州河。英、美、法等国军队在租界边界边沿装置铁门或铁丝网,并构筑工事。

其实,当时被称为“孤岛”的上海,在政治上并不“孤”。虽然,此时已不处于中国政府和抗日力量的控制范围之内,但是,由于上海租界的控制者英、美、法诸国,与日本帝国主义因根本利益冲突,而形成的矛盾和对峙,又由于日军毕竟尚未进入租界区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,正利用这种特殊的政治现状,通过各种形式发展起来。

在“孤岛”内,抗日言论未受到完全禁止,一度形成了独特的抗日“孤岛文化”。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,爆发太平洋战争,日军进入租界,上海的“孤岛”时期随之结束。

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海党组织,只留下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和一些人很少、分散进行着隐蔽活动的党员。党中央先后派潘汉年、冯雪峰到上海,通过鲁迅和文艺界秘密地寻找这些个别活跃着的党员。1937年11月上旬,经中共中央批准,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,省委由刘晓、刘长胜、张爱萍、王尧山、沙文汉组成,刘晓任书记,王尧山任组织部长、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兼党刊主编。省委成立后,展开了“孤岛”时期新的斗争的一页。省委的工作以上海市为重点,同时领导江苏、浙江两省和沪宁、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,还担负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。

针对上海沦为“孤岛”的错综复杂的形势,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,指出:“上海沦陷后,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、饥饿、流浪的痛苦,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……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,但日本对日本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间的矛盾,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地执行日本人的每一个意旨。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。”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,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,采取合法形式,扩大群众基础,发展党的力量。

1924年在大革命时期便入党的孙冶方同志,从莫斯科回国后一直被王明宗派所拒绝接受。1936年2月,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,他的组织关系重新接上,并担任了江苏省委第一任文化界运动委员会(简称文委)书记,副书记为曹荻秋,委员有王任叔(巴人)、梅益、于伶等。在上海地下文委领导下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,在戏剧界、电影界、文学界、新闻出版界,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。

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。他原名薛粤果,是江苏无锡县王祁镇(今属无锡市惠山区)人,生于1908年10月24日。1920年夏,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(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)。1924年7月,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东方大学(中国班)担任著名经济学家列昂

节夫讲堂的翻译。其时,他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。1930年9月,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。后来,在陈翰笙帮助下,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,前往江苏等地调查研究。从此,他便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。1933年,孙冶方与陈翰笙、钱俊瑞、薛暮桥、姜君辰、张锡昌、吴觉农、孙晓村、冯和法、徐雪寒、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,创办《中国农村》月刊,他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,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。他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,曾化名孙宝山、亨利在《华年》《新世界》《新认识》上发表文章,用工厂的实际调查材料,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脆弱性,指出其中的封建剥削痕迹等。

在抗战时期险象环生的“孤岛”上海,同为中共地下党员,孙冶方与沙文汉、陈修良、顾准、王元化等结识,并成为终生的挚友。

孙冶方的老朋友陈修良写过《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》一书,王元化读后非常赞赏,说:“它使我回到‘孤岛’时期刚刚入党的年轻时代。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。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,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,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。他们就是孙冶方、陈修良、林淡秋、顾准、姜椿芳、黄明,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。”

是时,孙冶方不满三十岁,却已久经磨炼,沉着冷静,颇具亲和力。在他的副手顾准眼里,孙冶方“不拿架子,平易近人,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”。而顾准才二十岁出头,早已成名沪上,激情四射,成为文学青年们的“偶像”。两位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,成了“孤岛”文坛上抗日力量的组织者。顾准稍后接替曹荻秋担任了文委副书记。孙冶方、顾准两人共同主持地下文委的工作,可谓一时之选,珠联璧合,尽管顾准在“文委”工作时间不长,但仍做了不少工作。当时,孙冶方和顾准精神焕发,精力充沛,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,深受大家的拥戴。时隔几十年,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。王元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:“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,顾准是我的领导。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,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。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。”

“孤岛”地方虽然不大,但却汇聚了上海文化界大批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,他们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如同江潮澎湃,汹涌澎湃,构成了波澜壮阔、十分壮观的革命画卷。“孤岛”的形势正如顾准所指出的,“上海成为‘孤岛’以后,最初我们对工作环境恶化的估计是过分悲观的。事实上日寇势力一时还伸不进租界,英美法帝国主义和日寇之间的矛盾,随战局的发展,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尖锐化了。群众的抗日情绪是极高的,形势变了,上海周围作战时期那种表现形式是不可能了,他们正在期待某种适宜的形式来组织他们和表达他们的政治情绪。”(《顾准自述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)

基于对形势这样的研判,在四周都是沦陷区的租界里,孙冶方和文委的成员们如夏衍、田汉、钱俊瑞、曹荻秋、于伶、巴人、梅益、顾准等共产党员和爱国文人,报人一起,高举抗日大旗,办起许多进步抗日报刊,与此同时,抗日救亡文学、戏剧创作也异常活跃。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“上海孤岛文化运动”。

在这里,公开和秘密出版的抗日报刊很多,一时间犹如雨后春笋破土,山花烂漫怒放,让沉闷已久的文坛耳目一新,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为之感奋精神振奋。当时,在孙冶方主持的地下文委直接领导下,公开出版的报刊有《译报》《译报周刊》《上海周报》《学习》《求知》《上海妇女》等;秘密出版的有

《时论丛刊》《内地通讯》等。党直接领导的出版社有复社、北社、新知书店。

“孤岛”时期是孙冶方和他的同志们生命中激情燃烧的岁月,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。郭大力、王亚南尽十年之功的《资本论》三卷,终于译竣,文委委员梅益译出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复社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《西行漫记》《上海一日》,文委委员于伶排出了《夜农村经济研究会》,创办《中国农村》月刊,他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,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。他积极从事左翼文化运动,曾化名孙宝山、亨利在《华年》《新世界》《新认识》上发表文章,用工厂的实际调查材料,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脆弱性,指出其中的封建剥削痕迹等。

孙冶方除了组织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外,他积淀已久的经济学功底结合革命的热情,如火如茶,不断喷发。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、社论、时评,如《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》《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》《抗战建国的新进步》等,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政策,分析世界经济形势,论述民族的解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,提倡抗战建国,上海的各大报刊几乎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他的文章。

“虽然敌人是残暴的,工作是危险的,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,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”

在孙冶方领导下,中共地下文委坚决贯彻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,把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。他们的做法是:第一项工作,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,由文委委员于伶等同志出面,先后组建了“青鸟剧社”“上海剧艺社”等13个职业剧团。这13个职业剧团,几乎动员了戏剧界的全部主力,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、金山、田方、王莹,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,著名戏剧家洪深、宋之的、阿英、许幸之、顾仲彝等人。他们先后演出了《赛金花》《夜上海》《离魂草》《上海屋檐下》等剧目,占领了整个大上海舞台,坚持和日伪殖民地文艺、奸奸文艺开展斗争,影响甚大,有些学校的学生工作,就是通过这些话剧的演出打开局面的。后来,这些剧团队大都奔赴前线和后方,其中有一部分开到武汉后划归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三厅领导,改编为戏剧队,成为抗战文化的一支主力军。

另一项则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,广泛组织群众性业余剧团,即在职业界各个联谊团体及工厂、企业、学校成立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,它们与职业的或大型剧团的配合和协作,卓有成效。群众业余剧团不仅在本单位演戏,还创办星期小剧场,挑选业余剧团中好的剧目,于星期日上午轮流售票公演,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曾经称赞:“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!”

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:“当时职业界、学生界、妇女界等群众团体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。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、璇宫剧场演出,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草剧场演出。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”(孙冶方:《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》,收入《上海“孤岛”文学回忆录》下册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)

岁月流逝,对这些“孤岛”上的战斗,其具体细节已成吉光片羽,姜椿芳同志去世前为我们留下了《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》,弥足珍贵,其中谈道:“在整个工作中,从三八年起到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,组织上变动多,领导人也非常变动。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三九年四、五月,大约一年左右。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。……一九三九年秋,顾准向我

孙冶方:《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》,收入《上海“孤岛”文学回忆录》下册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年9月出版

在「孤岛」文坛披荆斩棘

孙冶方与抗战初期上海地下文委

罗银胜



▲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恢复后,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点旧址(今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)

资料图片

▲年轻时的孙冶方

资料图片



爱可亲的憨态,这种憨态使得王元化他们这些当时刚入党的小青年都很喜欢他,不知是谁还给孙冶方起了个“妈妈”的绰号,这名称一下子就叫开了。

多年以后,回想起这些往事,王元化心情依然不能平静:“我们虽然幼稚,但懂得他对我们的爱护,尽管他从未向我们公开表露过。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,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,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汲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。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,虽然敌人是残暴的,工作是危险的,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,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。”

为了党的事业,随时准备牺牲自己

“孤岛”由于孤悬在沦陷区内,四面为敌人所包围,斗争环境是极其错综复杂、曲折微妙的;同时,又由于是在抗日大潮狂卷的形势下,持各种各样不同观点、立场、方法和习俗的人,都聚在一起。因此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,确实需要有一种高超超熟的领导艺术。孙冶方本人不是搞文艺工作的,他的专业在于经济学领域,但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,作为领导“孤岛”文化活动的文委书记,他必须深入了解文化活动的广阔内涵及其运动规律,以便能够准确地把握斗争大方向。当方向、方法和斗争策略出现了问题时,能够及时地加以纠偏校正,及时地“刹住车”和扭转错误有害的倾向。

1938年,上海文艺界对于鲁迅杂文的看法,出现了一场被称为“鲁迅风”的大争论。其中,有的人虽然是左翼作家,有的还是文委委员,但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。他们认为“鲁迅风”(即鲁迅杂文的文风)已经过时,现在是抗战时期,应该直着嗓子说话,王任叔(巴人)等人反对这种看法,认为鲁迅的战斗风格永远也不过时。这虽然对于鲁迅文风的理解和认识问题,但正当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之际,进行这场争论不仅会使群众转移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注意力,而且也容易使敌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孙冶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,于是便以文委名义召开会议,及时地组织大家讨论、研究这种形势,邀请论战双方坐到一起座谈应该怎样统一认识,尽快地终止这场论战。

孙冶方这样洞察明鉴、鞭辟入里地分析,使论战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,最后都自动地停止了这场历时两个多月、在文坛上轰动一时的争论。在孙冶方的领

导下,于1938年年底由《译报》主笔钱纳水出面召集了一次文艺座谈会,论战双方主要代表人物王任叔、阿英、林淡秋、柯灵、杨帆、王元化等人都到了会,大家统一了认识,会后在报上联名发表了《我们对于“鲁迅风”杂文问题的意见》。论战的圆满结局,既促进了上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,同时也使许多作家提高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认识,从而推动了杂文的创作。

在当时那样严峻的环境下,按照规定,是不允许党的领导人直接与工人、学生、职员等群众救亡组织发生联系的,只能通过这些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和基层支部发挥作用。但即使是这样,孙冶方也总是尽量地想办法深入到群众中去。文委委员、戏剧小组负责人杨帆后来回忆说:“从1938年开始,江苏省委派来具体领导我们文化支部的是沙文汉和孙冶方。我们的支部会(文化界救亡支部),孙冶方几乎每次都参加。”在那抗日高潮汹涌澎湃之际,上海“孤岛”里有一回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入党。孙冶方看了,心里特别高兴,他常常找到这些年轻同志与他们谈话,手把手地教他们工作方法和与敌人作斗争的艺术。

“孤岛”不是世外桃源,危险处处存在,日本特务、国民党特务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这支抗日的生力军。1937年陈修良介绍她宁波女子师范的同学、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洪克平与孙冶方结为夫妻。孙冶方与洪克平夫妇位于“孤岛”内贝勒路的家是中共秘密联络点。潘汉年、沙文汉、曹荻秋等中共领导以及顾准、夏衍、张乐麟、王元化等左翼文化工作者,都多次在此开会,洪克平常常坐在弄堂口为他们望风。

孙冶方还负责着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——每天编辑出版延安新华社电讯。孙冶方三番五次到洪克平家说:“要是过了午夜12点我还没有回家,就不要等我了,那我一定是出事。你要销毁文件立刻离开。”

为了党的事业,孙冶方随时准备牺牲自己! 1940年8月,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,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、桂林、贵阳等地,于次年初到达重庆。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,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在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。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孙冶方说,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,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。孙冶方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,再经香港到上海,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,于1941年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,从此便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)